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380 毫米降水线

——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380 毫米降水线

——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

鲁顺民

380 毫米降水线

——世纪之交北方的农村和农民

鲁顺民^{*}

一、“待业”的郭主席

到树儿梁乡，真是麻烦劳累了我高中时候的同学郭玉成。

郭玉成是前乡人大主席，在该乡一呆就是8年。玉成于1986年山西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县农业委员会。干事而副科，副科而正科。步入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必然要经过这样一条奋斗轨迹，或者说，许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人正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奋斗着。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树儿梁乡地处黄土高原腹地，资源缺乏，工副业不发达，乡民多赖种地为生，属于一个纯农业乡。这个乡仅有的一个乡办煤矿前几年连年亏损，对改变全乡农民的生活不起根本性的作用。二，树儿梁乡在最近全

^{*} 鲁顺民，1965年生，山西河曲县人，《山西文学》编辑部主任。
本文原载《黄河》2001年第5期。

国全面铺开的撤乡并镇工作中，被并入资源相对丰富、人口相对集中的刘家塔镇。行政区划既不存在，也便因行政干扰的减弱而增加了信息的真实程度。

2001 年的“五一”节，我拜访玉成。他正在家里闲坐。一个月前撤乡并镇之后，他只在举行撤乡并镇仪式上去过一趟刘家塔镇，剩下的时间待岗在家，等候组织部门的安排，百无聊赖。其时，前乡书记、乡长都已经被安排到了县直机关，他，还有 22 位乡政府工作人员何去何从仍无着落。我们一直来往密切，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郭玉成在我们那一茬高中生中，成熟早，有头脑，善思考，多独立见解，是一位佼佼者，在农业大学学的又是农业经济管理，又有 8 年乡镇干部的经验，所以谈话极有条理，数据掌握十分准确。但是，我还是看出他平静的面容掩盖下焦虑的心情。

我一向以农家子弟自炫，但是，农村在我这里，仅仅是童年的记忆，是构成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是耕作和收获之间琐碎的过程，是具体的某个邻居或者亲戚。也就是说，对农村，我远远谈不上熟悉。尤其是做了编辑之后，不断地阅读着制造自乡村的各种文本，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农民到底如何生活，如何喜如何悲，在感觉上竟然日渐模糊。这样，我找到了郭玉成。

说起农民，两人都很投机，我感慨说，今天是国际劳动节，这个劳动节却是与农民没有任何关系，农民的劳动不算劳动？

玉成笑起来。笑得无奈。下面是谈话内容。

一、总体上讲，县属乡镇农民的负担并不是太重。单以树儿梁乡为例，“三提”、“五统”连带农业税大致上每人每年20~30元，视收成丰歉而定。人均土地2亩多，糜子是该乡主要的大田作物，以每亩400斤产量、每斤原米0.4元计，则人均毛收入380元，刨去化肥、种子等项开支，以每人100元计，则人均纯收入可达280元。乡村提留以30元计，则占到10%多一点，高出国务院规定额度5个百分点。这是一笔粗账，若细究起来，由于种植品种的不同，收入也大有出入，总体平衡约在5%的国家标准之间。但据说有个别乡镇的农民负担比较重。玉成说，国家扶贫工作规定的温饱线是人均收入250元，但以当今的物价指数衡量，人均收入达不到750元，简直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二、树儿梁乡的土地大部分属于坡耕地，决定了农业种植粗放经营、靠天吃饭的特点，而日常开支，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地之入不及用之出，遂谋他途。打石头、烧石灰是该乡乡民的传统工副业，但是近年来，城市建设往往由施工单位垫资施工，石头和石灰卖出之后要不上钱是常事。我们俩的同学郝满良，经营一座石灰窑已经两年之久，在县城欠款多达2万余元，以致被拖垮停产。常常贴上店脚之资下城讨债，往往只能讨得一些皮毛，包工头只给一二百元就打发了事。而下煤窑也属传统工副业，可是，该地区的煤质不好，含硫量高，销路不畅，下煤窑也常常欠资。

还有一些农民，在80年代初即买小四轮搞运输，拉煤拉石灰下城里卖。1993年，县里改造沿黄河的一条公路，是谓“龙口公路改造工程”，工程竣工即设卡收费，一段长度不及

10 公里的公路，收费至今，投资应该早已收回，但关卡并不撤销，过卡费用反而提高不少。小四轮运输本来本大利微，农民不堪其负，该乡的小四轮几乎全部停了下来。

三、苦恼的乡镇工作。树儿梁乡前任书记调任某镇担任书记，前任书记临行给他讲了该乡复杂的情况。该书记到任之初，要调整某村村干部。该村因宅基地引发的矛盾十分尖锐，历时已久，干群关系紧张。就要开党员会商量干部调整事宜的时候，竟有人将会议室门从外面锁住。

第二次开会，就有一个后生强行闯入会场，主持会议的说，今天是开党员会，你不是党员，请你回避一下。

后生说：我二爹（即二伯）是党员，我是替他来开会的。

主持人说：那你叫你二爹来，他在哪里？

后生说：我二爹前月就死了，我是替他出来说话的。

活人要替死人说话，当然不是要说死人话，是活人自己有话说。

干群关系紧张可见一斑。

但不管怎么样，该村还是顶着种种压力将原村干部换了下来，原村干部由于宅基地问题，被开除党籍。但是不久，就有几个吸毒人员找上门来，质问书记为什么换村干部不经他们同意，并且威胁说如果以后要换村干部，需让他们弟兄们知道，他们同意才能换。

四、关于贫富分化。郭玉成介绍说，在该乡，最富有的人有存款十几万二十来万，而最贫者则近于赤贫。大致上说，全乡贫困人口还是占很大比例。一村之中，能数出来的“过得可以”的好人家也就三五户，没有哪个村子全体或者大部分

村民过上比较好的日子。

富起来的人，属于真正“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是 80 年代中后期，先行一步，靠下山西省宁武县包煤窑和拉起工程队做工头富起来的；而贫者，往往是家小族微，社会关系不广，或残病在身；还有小部分则是属于“不会过日子”者。所谓“不会过日子”，无非是好吃懒做，不善筹划生活。他举了一个例子，该乡某村农民王某，承包的土地与其他村的农民并无二致，但单靠种地，只能“管个肚”，也仅仅没有冻馁之虞。所以，几乎所有青壮劳力莫不利用农闲时节就地打石头、下煤窑，非此则无法见到现金。但王某在外出从事这些工副业的时候，赚够一百多元，只要够当月花销之资，就再也懒得动弹（我们这地方称劳动为“动弹”，或竟是农民的一种生存观念？），买酒割肉且消受一番。如此，常常是手无余钱，日月紧巴，而收罢秋粮，山下有小贩拉苹果来山上换粮者，善于筹划生活的人家，在这种时候断断不会拿着自己的嘴来赌日月，十分谨慎，但王某则不管不顾，只要有来换的，就挖一些粮食去换，如此，每到春季，就青黄不接，遑论有钱投入其他产业。

五、当地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为糜子、玉米、土豆、黑豆、绿豆，还有少量的谷子。乡民以糜谷为食，白面、大米莫不从市场购得，非本地出产。除玉米是大路作物之外，其余实际上均为小杂粮之属。黑豆、绿豆的经济价值稍高，其余则“腿不长，跑不远”，销路不好。黑豆供应本地牲口精饲料和做豆腐已经足够，无需远运，不致于大量积压。绿豆前几年的行情看好，最好的时候可卖到每斤 3.00 元，但该农

产品受国际市场影响特别厉害，价格波动大，经营风险大，近两年来做绿豆收购生意的农民莫不亏本。其他作物腿也不长，市场狭小，深加工的价值也不是太大。新近有人从北京引进技术，以糜子米为原料开发一种保健饮料，奈何规模太小，无法消耗更多的原料，也是杯水车薪。

六、县里给乡里下的任务是年完成财政收入 30 万元，这对一个纯农业的乡来说是一个很难承受的数字，但事关全县财政大局，更关乎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只能硬着头皮想尽办法来完成。好在还有一个乡办煤矿，有一爪子没一爪子紧着刨闹。

七、本县共有 12 万人口，其中党、政、教三块人数在 7000 人以外，将近 8000 人。也就是说，这近 8000 人全是靠县财政来养活。而该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全县 12 万人，则每 17 人负担一个行政人员，以 4 口之家计，则每 4 户就得养活一个行政人员。据该县 1989 年的县情统计资料，在 1989 年，该县“吃财政饭”的人是 2000 多一点，13 年间一下子多出将近四倍。

玉成从 1986 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月工资仅有 470 多元。尽管如此，假如以每一位党政干部或者教师每年工资 5000 元计算，一个县不办任何事情，财政收入至少必需达到 3500 万元，而河曲县 2000 年的财政收入才首次突破 5000 万元，除去上划的税款，留在县里所剩无几。财政压力甚大，捉襟见肘。

八、该乡在撤并之前，中央已经明确下达文件，农民土地承包 50 年不变，但在该乡并未实行。其原因有二，一是人

口自然减员。包括死亡、上学、外迁。二是自然增员，包括娶回新媳妇和出生的孩子。这两个原因都要求土地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而该乡既是纯农业乡，对土地相当重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只好暂时不实行 50 年不变。

谈话持续一个多小时，对前树儿梁乡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一、该乡自然经济的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工副业极端不发达，更谈不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即便是有一些，也属于自然农业经济的延伸，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看来也不单纯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农民负担重与不重的问题，要回答“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需回到农业、农村、农民那里寻找答案。

三、树儿梁乡既是一个纯农业的乡，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产业。因没有确切的人口变迁统计数据，故无法确定在单位面积土地不变而单纯依靠单位土地产量提高养活人口多寡的变化曲线。清代乾隆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的农业单位平均亩产是 162 斤，也就是说，该地区土地单产在三百年间提高了近三倍。人口增长是不是与此产量相随而进？

我们相约，5 月 4 日，郭玉成陪我到树儿梁乡进行实地现场调查。

二、悬挂起来的树儿梁

5 月 4 日上午，给郭玉成兄打电话，说立即上树儿梁乡，

并预先申明，必须在那里住一夜。

玉成兄爽快地答应了。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这一天晚上，他有一个饭局，是原来树儿梁乡的党委书记召集过去的同事们聚一聚。官身不由己，进入社会的人，大都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在圈子里既有竞争，也有联合，一个一个圈子遂结成一张不可触摸的并且时时在颤动着的网，而每一个人无疑就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农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在这种社会形成的官场，不仅将乡村社会里的人情关系发挥到了极致，社会诸项运作也循着人情的游戏规则而运作。

本来，玉成安排好，我们准备乘去树儿梁的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但是，我却给已经荣任市工行副行长的同学王智明打电话，借他的车将我们送到树儿梁村——我也不能脱离人情结成的网，离开熟人，寸步难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否则，我就得中午一点钟顶着灼热的阳光准时到达预定的地点等车，还得坐着那辆没有牌照，安全系数极小的乡村公共汽车满街绕上三圈，然后行进两个多小时走不到30公里的油路上土路，平地到山坡，不走个天旋地转，人仰马翻是到不了的。

到树儿梁乡，经过河曲县的平川地区，沿黄河修有一条出县公路，其实这条公路早在70年代就已经修成，属于乡村三级公路，三合土做底，碎沙铺面，进入80年代，始铺柏油，进入90年代，又重铺了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报纸上咋呼呼地传出晋西北扶贫公路全线开通的消息，看看新标的地图，却原来指的就是这一条路。难道原来不通？总之是设

了卡，开始收费，卡子上前几年理直气壮地写着“借款修路，造福百姓。收费还贷，天经地义”的标语，看着总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也就是玉成说过的那个让树儿梁左近农民的四轮车全部停下来的卡子。

这道卡子设在河偏路由黄河峡谷下到平原地带的两端，过往车辆一头交费，另一头验票。而这两个关口恰恰设在树儿梁、刘家塔两个乡镇通往县城的要津之处，也就意味着，这两个乡镇的农民要想进城，就必须交钱。

5月1日玉成说到这个卡子，我总感觉玉成关于农民因卡子而停下四轮车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今天，我望着车辆寥落的公路，看着收费亭里衣冠不整的收费人员，暗暗地替农民算了一笔账。

以进城卖炭为例：

到窑口拉炭之煤炭成本以现行价格计算：25元/吨。以一车可装炭2.5吨计算，则需 $2.5 \times 25 = 62.5$ 元。而到城里，一车仅售价80元至90元，随行就市，超过100元的时候很少。以90元售价计算，则毛利得27.5元。设卡收费以来，每过一车先是2元，后涨至5元，也就意味着，一辆四轮车往返一次仅交在卡子上的钱就是10元，剩下的17.5元中，还需除去柴油费用、车辆折旧费用以及农机管理等杂费，这17.5元钱真正落到农民手里还剩多少？

玉成所言不虚。固然，煤炭市场疲软和城镇居民取暖、炊饮用煤市场的狭小有限是农民取利艰难的根本原因，但这个卡子无疑雪上加霜，彻底断了这条财路。

即便设卡收费五六年来尚未收回筹款修路的成本，但是，

看一看收费亭里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想，这成本怕是再过十个三年五载也难以收回来，因为这一岗位牵动的是城镇青年就业的问题。上下两岗以每班值岗 6 人计算，则这个收费站至少是 18 个人的饭碗。经济落后直接导致民间市场的贫血甚至血管萎缩坏死，民间市场的不发育，又直接导致城镇青年只有大批地拥入政府等职能部门。城镇青年就业且如此，更不用说农民了。而这一切负担，又直接侵害到农民的利益，或者说，这一切负担农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

路上依然车辆寥落，车辆寥落的柏油马路看去很是干净。

山川依旧，暮春时节灼热的阳光被天上的云彩遮了一下，将庞大的阴影一点不剩全部落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沟壑之间立即斑斑驳驳，很奇怪地呈现出一层淡蓝的颜色。脚下的黄河，因为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阻隔，此时的河水清淅淅地流淌在壁立千仞的晋陕峡谷中，黑青黑青的。

树儿梁不在梁上，在沟里。

一条简易公路钻沟而进，公路开在沿沟的石岸上。在两边沟沿，可以看到一座座废弃的矿井，褚黄色的矿滓随处可见，和两边的黄土丘陵的颜色极不谐调。玉成告诉我说，这是刘家塔镇的硫磺矿，开采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但是，由于采掘方法原始落后，致使成本加大，尽管工业用硫价格不菲，但也难以为继，纷纷停产。满目破败，令人心酸。

与之相比较的，是黄土高原上一片片、一块块，哪怕是窄窄的一条巴掌地块，让农民们精心而小心翼翼地爬梳得干净整洁，松软舒缓，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精耕细作的旋律。沟岔里的桃果树开着粉的红的白的花，树冠掩映在舒缓自然的

黄土坡面后，显示出勃勃生机。去年冬天，下过一场厚雪，墒情还好，农民们一家一户忙碌在田地里。

黄土覆盖层非常之厚。

我很快发现，树儿梁的土地充分利用到了极致，就连坡度达 40 多度的坡地也不例外，被梳理得规整有致，等待下种。如果将这些松软的耕地比作毯子，这些毯子就是东一块西一块，高一块低一块平铺着，斜挂着，甚至倒垂着。

去年，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凡坡度在 20 度以上的坡耕地均在退耕之列，每亩补助 20 元、200 斤粮。像这样的应该退耕的坡耕地，是农民不愿意退还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了问题？

请教玉成，得到回答：退耕还林，实行的是定点示范，河曲仅有几乡列在其中，没有树儿梁。

原来如此。

于是，树儿梁就还悬挂着，悬挂在这里已经几千年了。还要悬挂下去。

三、“二区”政府

进了树儿梁乡，因为乡政府已经撤并，乡里没有留守人员，玉成说已经安排好直接到距原乡政府三里多的树儿梁村。没有乡政府工作人员的乡政府，还像许多山区的乡政府一样，在沟畔的一带平缓地上很显眼，但是却安静了许多。树儿梁乡政府远离村庄，处在树儿梁、臭儿洼、冯家庄三个梁峁上

的村子的包围之中，离哪个村庄也不近，也不远，毕竟显得孤零零的。

走过一条土质大坝，玉成说，当年乡政府选址，全是因这条大坝。此坝筑于70年代，是全树儿梁乡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奋战一冬的结果，控制流域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2000多条沟道。现已淤满，因为尚未解决沟道出水问题，坝地还没有完全受益。因此，这是一条极度危险的坝，一旦下雨，全流域上千条沟岔的洪水连水带汤全要经过此坝下泄黄河，每年到雨季来临，乡政府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坝上值班，观察水情，加固坝体。玉成说，雨季下雨频繁的时候，洪水像一彪打家劫舍的匪兵一样，彻夜吼喊，浑汤浊水将牛大的石头带着在河床里乱滚，通过溢洪道下泄时激起的黄色水雾有数丈之高。此坝一垮，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里一呆就是8年的郭主席看着这条坝，说起来不无忧虑。

他说，乡政府撤并之后，这条坝距离新的镇政府有十几里，管理起来困难就大了。再说，沿树儿梁大坝控制流域内，今年一连撤了3个乡，这就意味着，方圆左近400平方公里没有一个乡镇政府，农民办点事要跑很远的路，撤并的布局显然不太合理。而且，树儿梁乡从抗战时就是老二区政府所在地，管理着方邻左近和偏关县数十个乡镇的地方，说撤就撤了。撤并乡镇，单以管理范围之内的人口为依据，而不考虑地域的广狭，是十分欠妥的。

过坝梁，看见那些被淤好的土地，平展悠悠，绿树棵棵，地垅俨然，农民确是受惠不少。玉成说，现在说受惠还为时

过早，因为洪水期间过水量大，天旱时候庄稼长不好，天涝的时候庄稼同样长不好。而每次降雨量过到 20 毫米以上，洪水就纷纷从千百条沟里一齐涌出，势不可挡。

上一道坡，再上一道坡，梁峁上是真正的树儿梁，那时，老二区的区政府就设在这个村子里。

我们没有进乡政府，直奔树儿梁村而来。树儿梁上不平整，汽车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一个碾打粮食用的场面才掉过头。村子里房屋以石碓窑洞为主，墙面粗犷，院落因势而建，或高或低，错错落落，所以户与户之间交通的道路也往往在上一家的墙根，也就是下一家的窑顶，宽可容人，断难通车。石碓的窑洞一律古旧，很难判断出建屋的年代，只能从颜色的新旧上可略略看得出建筑的时间顺序，但一般也都很远了。而新碓的窑洞只在村子外围一线散散落落地排出一圈来。

村子俨然是一幅古老的风景，风景里没有人，风景与持续不断的小风不停地摩擦着，风随意紧促一下子，一阵黄尘就顺风而起，划出一道风行过的痕迹。

玉成说，他已经和村支书联系好，由村支书带着我在村子里看一看，我们今天或住在他家，或住在乡政府。

他这一说，我就后悔自己没有跟他说清楚，本来，按预先计划，是先从普通村民入手，然后再找村支书核实。直接找村支书，难免会干扰获得信息的可靠程度。架势拉得足够，仿佛焦点访谈。

玉成却说：现在正是春耕下种时期，村子里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他指一指寂静的山村。我信。

也只能如此。况且玉成说：你放心就是了，这村子的情况有什么可隐瞒的，我给你隐瞒点还差不多，不过到现在你知道得比我还多。说罢二人相视一笑，循小路穿巷越街，找支书家。

碰见一个老者，肩荷板镢，从坡上下来，笑咪咪地问候玉成：郭书记下来了？

玉成在当主席之前，担任了好长一段时间乡党委副书记。

玉成答应着，问说：义成在不在？

问的是该村支书张义成。

回答是：哎呀，将将还见来。知道了，现在就知道了。说着，碎步子向坡下走过去。

奇怪的是，老者下到坡底，一下子彻底地溶入黄土之中，居然看不见一点踪影。

这时候是下午三点多，老者肩上的镢头在阳光下闪过一道残厉的光。

那种镢头极宽，刃部锋利，这是坡耕地地区特有的农具，靠它来整堰松土，尤其是坡度太大的耕地。牲口根本无法立足，就靠这一把镢头了。坡耕地上，经常发生摔死牲口的事件。

支书张义成在树儿梁村西沿坡下，将黄土截下一大块来现出一片平地，便建起一座齐整的院落。计石碓窑3间，靠西面又盖起两间线浇顶平房2间，计5间正房，宽大轩敞，但山村房屋大都如此，并不显出特殊来。特殊的是大门外停着两部铲车。院子里拴一条狼狗。

大门敞开，房门敞开，不见一个人。张义成不知道在哪

里。

那条狼狗狺狺地吠了两下，就停下来不叫了，可能认出了郭主席。玉成出了大门冲村子里喊了两声，却没有答应，村子仿佛一下子变成一座空村。无奈，我们只好等。玉成径自推开门让我进去，我说不合适吧，没有人怎么好进别人的家里？玉成一边往里让，一边说没关系的，仿佛倒像是个主人似的。乡村两级干部之间关系之亲密由此可见，而恰恰是这种大大咧咧的亲密关系，极其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或者说，乡村两级政府之间上传下达的各项任务，就在这大大咧咧的亲密关系之间完成。乡村两级如此，县乡两级、县市两级竟或再往上，也莫不如此。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军事化管理的痕迹日久逐渐淡出，上下级之间的权威感也随之减弱，维系上下沟通的准则除了组织纪律和行政命令之外，一个重要的准则就是人际关系，而后者则往往比前者显得更为突出更为有效。这种关系的优长之处显而易见，其弊端之大也是显而易见。玉成将我让进窑洞，他竟将我一个丢下自己出去叫人去了。

趁此间隙，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村支书的家。

虽是窑洞，却很是整洁明亮，三面墙上都贴着画，这种画的印制单是鲜艳，靓仔靓女展玉臂，露酥胸，几双大眼睛看人无所顾忌，画上面还五颜六色字体各异地写着一些温馨呀甜蜜呀的祝福的话。我猜测没有出现的张义成的年龄竟是二十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但正墙上两张画则又让我疑惑起来。正墙，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在一起的情景，是以 60 年代初毛刘在机场迎接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的照片为

蓝本绘制的，三人满面春风，衣着鲜艳，颜色极其夸张，使人疑心是三个美妇在一起交谈。南墙，绘的是十大元帅跃马扬鞭的情景，十个人着天蓝色元帅服，却一个个唇红齿白，人欢马叫，极其热闹。三大常委十大元帅就这样挤在树儿梁村支书的家里，政治局随之搬到山庄窝铺，固然年画风格夸张，但分明地体现着主人的潜在心理。窗台之上，一株君子兰很努力地开出两朵花。

家里电器有：

24 寸彩电一台，配电视接收器。

“爱多” VCD 播放机一台。

电话一部。系天线发射和接收信号。

交通工具：

“金城 100” 摩托车一辆。

其余再看不见其他。玉成一会儿回来，依然没有找到张义成。玉成证实，也果然再没有其他。但后来我还发现他家里有煤气灶具 1 件。村中年轻人结婚，都要有煤气灶具。

不一会，先是张义成的妻子回来了，这位村支书的妻子大约三十多岁，开朗乐观，进门甚急，一头问候郭书记，一头就骂起张书记，一头风风火火出去唤了两嗓子，张义成立即就回来了。

张义成四十出头的年纪，看不怎么精干，却显得十足精神。他说他今天一直就等在家里没出去，没想到我们会这样快上来，刚出去转了一圈。

坐定，倒茶，茶水径直倾倒在罐头瓶里。一只猫拖着一个铁圈儿在地上跟主人进进出出。张义成说，之所以给猫如

此装备，是因为怕吃上死耗子，家村鼠害甚剧，村人多用毒药灭鼠，这样一来，猫吃耗子，都二次中毒而死。阖村之中，单留下此猫。

村中情况如下：

全村 620 口人，100 余户（因娶了媳妇回来有未和父母分户者，故此数经常变动，因而也带动了土地的变动），常年在村人口 500 出头，常年保持 100 来人在外打工。从 1997 年到 2000 年连续 4 年大旱，外出人口甚至干脆举家出迁者日增。连带饲草饲料地共 2500 多亩土地，人均 3 亩余。

村子户居分散，分别在三个梁头上，牵牵连连，往来无碍。

村中只有张姓一姓，和树儿梁乡碓臼也村同属一张。系明代从陕西迁来。张氏一族，在当地属书香气十分浓厚的家族。出过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现在在外地当教师当干部的人很多，都是“念书”念出去的。单是树儿梁一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就考上 24 名大中专学生，其中有 1 人在美国。

郭主席玉成的岳丈张直仪先生，是周遭地区有名的兽医，县境里可数的几个高级知识分子之一，碓臼也村人，与树儿梁张家一族。临去世前，曾著家谱一册，分散两村以作留存。

张义成共有一双儿女，均在校读书。儿子去年考取山西医科大学，但没有去。没有去的原因是在老师和学校领导劝说下留了下来，孩子聪明，此番高考并没有将潜力挖掘出来，宜再复读一年，今年一定能考一个好大学。现在离高考只剩下两个多月，所以义成经常心下不安，妻子干脆就到县城赁屋居住，给孩子做饭，照顾考前的儿子。

但总体上来讲，树儿梁村在县境内还属相对贫困之区，日月窘困，甚至瓮里连米都挖不出来的人家有的是，特困户大约在 20 户左右。

解决特困，一方面是由村里的包工头在外揽工，带上本村人去做，如打坝、筑路、盖房起屋等，地点不定。支书张义成做过多年包工头，一旦有活，往往只带本村的青壮劳力出去。另一方面，则外出打工，从 1997 年大旱至今，全村百十多口人都出去了。而出去打工的，也绝大部分是到包头。有的甚至已经举家迁出，定居包头。他们在包头也多靠卖力气吃苦挣钱，在轧钢厂抬铁水，或“站桥头”（劳务市场）做临活，竟或在河套地区包地种，易地为农。人员以青壮年为主，文化水平不一。但是，全村高中毕业后回村者甚少，几乎全部在外边打工，或者说，高中毕业之后从来没有人回村劳动过。现在，高中毕业留在村中者只有副支书 1 人。

为什么将包头作为首选之地？

河曲县的走西口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而走西口的人口迁徙，一直持续到六七十年代，人员大都散落在以包头为中心的西蒙地区，该地幅员辽阔，几乎每家每户在内蒙古都有自己的亲戚，有资料统计，通过走西口迁徙出去的河曲人，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到现在已经有 20 多万之巨，是本县人口的 2 倍。既然有这一层联系，到包头打工也是可以理解的。投亲靠友，依然是农民外出谋生的主要方式。

本村农民负担有乡级提留、村级提留、义务工以及公共事业集资四块，乡级“三提五统”计每人 30 元，村级每人 10 元，下来就是逢正月十五村里唱戏，一般情况下以户计，每

户 5 元 10 元不等，不足部分由村里设法解决。每年唱戏是村干部的一件头疼事，摊派太多，群众不满意，不唱戏群众仍然不满意。而村一级提留，因外出人口常年不归但户口仍在者不少，所以每人提留 10 元中还得替这一部分人垫入乡提留，以保证任务完成。

树儿梁村内无水可取，每家每户都有旱井一眼，即在院中下蓄水窑，冬季的雪、夏天的雨全部收集起来，密封消毒，但近 4 年来，雨雪稀少，自然积水无法供应，只能到乡政府的深井里去买水，一油桶水 5 角。树儿梁如此，其他村子也都如此，一乡几村都靠这眼深井来吃水。

四、拔尖户的收入情况

支书张义成初中毕业，1975 年 18 岁，到当时的公社里做了两年通讯员，提茶倒水生火，后来转为农机管理员。1981 年，回到村里，买了一部铲车，开始承揽工程做小包工头。弟兄三人，排行老二。1990 年担任村主任，1998 年担任村支书。父母均年迈，父亲 73 岁，母亲 70 岁，但还能下地干活。兄弟三人都过得不错，均是树儿梁村的拔尖户，大哥有一双儿女，都考上学校，正在上学。

张支书本人 18 岁初中毕业就到了公社，在公社里服务了不短的 6 年，是为了最终脱离农村，却没有成为一个公家人，复又回到农村，1981 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张支书买铲车一部，开始做工，是属于农村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的个人命运，也典型地反映着许多农村青年的个人奋斗轨

迹。

下面是支书张义成家庭收入的情况。

共种地 5 垧，约合 10 亩。“垧”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土地丈量单位，以一牯牲口一上午所耕之地为一垧，1 垧约合 2 亩，但树儿梁村坡耕地多，牲口耕地艰难，只能顶 1.8 亩多，仍以 2 亩计。因亩数是大约数，故统计数字不以亩数计。

农业收入：

5 垧土地，种有玉米、糜子、土豆、黑豆、绿豆等大宗作物，还有豇豆、西瓜等小宗作物。本来，我是要计算 2000 年一年的具体收入，但张义成说，2000 年全年有 80 天未下雨，大田作物几近绝收，只能以正常年份来计算。

一、玉米，1 垧，在坝淤地上。

1. 投入：化肥（底肥），54 元，七月（农历）雨季追肥 1 次，30 元；种子 6.60 元；因为未养牲口，须雇人耕种，雇牲口：50 元。

总投入： $54+30+6.6+50=140.60$ 元

2. 投工：耕种，8 工；锄地，6 工；收割，4 工。脱粒利用闲散时间，不计。计 $8+6+4=18$ 工。

3. 产出：约 600 斤/亩，计约 1200 斤。

4. 毛收入：玉米市场价，0.4 元/斤，2 亩玉米收入： $600 \times 2 \times 0.4=480$ 元。

5. 工值： $1 \text{ 工}=480 \div 18=26.70$ 元

6. 净收入： $480-140.6=339.40$ 元

2000 年，绝收。

二、糜子，1 垧，在坡耕地上。

1. 投入：化肥 58 元，中间追肥 10 元。种子自留，忽略不计。雇人耕地 50 元。共 118 元。

2. 投工：耕种 4 工，锄地 14 工（锄三遍），收割 4 工，碾打 3 工。共计 25 工。

3. 产出：500 斤/亩，共约 1000 斤。

4. 毛收入：0.4 元/斤，计 400 元。

5. 工值： $400 \div 25 = 16$ 元。

6. 净收入： $400 - 118 = 282$ 元。

2000 年，绝收。

三、土豆，1 垧，在坡耕地上。

1. 投入：化肥 110 元。种子 600 斤，每斤 0.3 元，除部分自留种，尚需购 200 斤，则种子一项 30 元。耕地，50 元。共计投入 $110 + 30 + 50 = 190$ 元。

2. 投工：切种 2 工，耕地 5 工，锄地 5 工，收获 15 工，共 27 工。

3. 产出：5600 斤。

4. 毛收入：每斤 0.2 元，则收入 1120 元。

5. 工值： $1120 \div 27 = 41.50$ 元。

6. 净收入： $1120 - 190 = 930$ 元。

若将土豆磨成粉面，每 10 斤土豆出 1 斤粉，每斤粉面 1.5 元，则仅得 840 元，除去投入成本，则净值 650 元。澄粉的废滓可喂猪。2000 年歉收，出苗时旱死，几近绝收。

四、黑豆。1 垧，在坡耕地上。

1. 投入：种子，14 元，化肥 59 元。耕地 50 元。共 123 元。

2. 投工：耕地 3 工，锄耩 6 工，收割 3 工，运输碾打 3 工，共 15 工。

3. 产出：300 斤，（2000 年欠收，仅 100 斤）

4. 毛收入：每斤 1 元，则入 300 元。

5. 工值： $300 \div 15 = 20$ 元。

6. 净入： $300 - 123 = 177$ 元。

五、绿豆。1 垧在坡耕地上。

1. 投入：种子，28 元，化肥 59 元，耕地 50 元。共计 137 元。

2. 投工，与黑豆项目大类，但收割碾打则倍于黑豆，因其粒小易爆，需十分小心，至少加 10 工。则共需 25 工。

3. 产出：与黑豆同，300 斤。

4. 毛收入：每斤 2 元，则 600 元。

5. 工值： $600 \div 25 = 24$ 元。

6. 净收入： $600 - 137 = 463$ 元。

六、其他。包括西瓜、豇豆，种于垌畔、自开小块地上，数量不多，产出多用自用，可忽略不计。所谓忽略，是因为不进行交易。

张义成一家农业收入，五项相加， $339.40 + 282 + 930 + 177 + 463 = 2191.40$ 元。

即以 5 垧 10 亩之数计算，每亩收入 219.14 元。

工副业收入：

一、养铲车两部，用于筑路、铲煤、修地和其他工程，平均 1 年 1 车做 3 个月，刨去折旧、农机管理费、司机工资、耗油等项开支，税后净收入 3000 元，2 车 6000 元。此项收入，

张义成说得很笼统，大约不属于农业收入，活多活少不定，又是支书身份，此项收入不便公开，为不引起误解，我便没有多问。但当我说，1车每年至少挣2000元吧，他马上说，不止，刨去各项开支一辆挣3000元是有保证的。即以每车3000元收入计。

二、去年养猪2头，因一般年下也养两头猪，故可纳入一般年下统计。

投入：仔猪150元/头，共300元；饲料2000斤玉米，每斤0.4元，折价800元，土豆2000斤，每斤0.2元，折价400元。青饲料不计。共投入1500元。

产出：300斤/头，共600斤猪肉。

毛收入：每斤猪肉5元，则得3000元。

割头税每头5元，计10元。

则净收入： $3000 - 1500 - 10 = 1490$ 元。

其他：

村干部工资，村里每年补助470元，县里通过乡政府补助400元，共计870元（2000年县补未给）。

三项收入为8360元。

那么，正常年份正常年景下，支书张义成一家的收入10551.40元。而农业收入为2191.40元，仅占总收入5%多一点。全家人均收入2621.85元，属于小康之家。

全家支出情况：

1. 乡村提留：每人40元，共160元。这和玉成介绍的情况有些不符，可能玉成指的单是乡一级的提留，此数含村级提留。占到农业总收入的8%。这个数字中，还包括农业税。

2. 子女教育费用：儿子念高中 3000 元，女儿念初中 1000 元。共 4000 元。

3. 买白面 4 袋，每袋特二粉 40 元，共 160 元；大米 3 袋，每袋 50 元，共 150 元。计 310 元。

4. 工作应酬和经常外出包工消耗甚大，每年肉、酒、烟三项至少 3000 元。

5. 礼金 600 元。因为交往的人较多，此项开支明显高于一般农户。

6. 电话 700 元。树儿梁只他一部电话。电信部门允许收费，但本村本家来打电话往往不好意思收钱，况且自己平常打得也不少，所以此项开支全部自支。

7. 电费：每月 15 元，12 个月计 180 元。

8. 粮食加工：200 元。

9. 水费 100 元。

10. 烧炭和煤气 200 元。

10 项大的开支相加，共支出 9450 元。全年收支相抵， $10551.40 - 9450 = 1101.40$ 元。若再除去一家人的衣服等日用品开支，全年大抵收支平衡，没有余项。

村支书在村里的工作围绕乡政府的工作节奏来展开，每年做的工作都一样，分地、计生、组织农建（农田基本建设）、修路、植树、收合同兑现。每年参加县乡两级政府开会 15 天，在村忙公务约 150 天，计 160 天。余下时间多用于出外包工做工。

调解民事纠纷当然有法律和政策依据，也取决于调解人的是否公平合理。多年来，频繁的上访事件许多是因处理不

公平而小事变大，最后闹到不可开交，一级一级上访。但村民矛盾纠纷的调解往往视支书的威信高低。村支书的责任在于“压事”，除了杀人害命触犯刑律之事，做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如果威信高，处理起来就举重若轻，反之则越闹越大。

张义成举了一个新近处理的家庭纠纷事件。村中某人与妻子感情不合，前些天夫妻俩忽然吵了起来，丈夫将门从里闩死，怀揣着农药要喝，把家里闹得沸反盈天，父母双亲死活也叫不开门，这时做娘的就跑到支书家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张义成赶忙跑去，用力拍门，大骂某人不是东西，是孬种，没骨头，三言两语就将门叫开了。进得门来，张义成对准那男人当胸抡圆了就是一拳，说：你把毒药拿出来，明天要自杀你明天再买去。

某人乖乖地将农药从怀里掏出来。一场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说到夫妻邻里矛盾，张义成说，本来说家长里短，闹个矛盾是常事，但近年来家庭矛盾好像特别严重，一闹就是要命上吊，土沟乡某村，有一个人因为赌博无钱遭人奚落，就喝毒药自杀了。尤其是农忙时期，家庭矛盾尤其厉害。这里头的原因，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苦重，变得毛躁。

玉成介绍说，当初选择张义成做支书，一是因为他是村里的能人，二是因为他能拿事，在村里威信高，三是因为见过世面，社会关系广，和乡里的关系处得比较好。

还有一个原因怕是玉成不便说出来，义成也不会承认，那就是兄弟多，势力大，没人敢欺负，而义成的哥哥的两个儿

女都考上学校，自己的儿女学习又很好，因而在村里的地位比较高。在村里，谁家“出了人”，是人丁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基本决定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

调解民事纠纷本来是一个法律问题，在旧时代乡村社会，往往依靠宗族的力量来化解矛盾，不惹官司不打官司是乡村社会里默认的一个社会秩序尺度。建国之后，宗族权威被完全彻底地打破，代替宗族力量来整合乡村和施行行政动员的是乡村各级政府，但是，政府机构毕竟不能投入过量的成本来管理如同汪洋大海般的农村社会，影响力也不可能完全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就依靠着一个一个村级支部和委员会来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树儿梁村既是一姓之村，家族大户虽然已经消失，但是宗族意识还是存在。张义成叙述的这一案例就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

农民有委屈，自己力量不足以解决，就以伤害虐待自己的身体为极端解决的途径。乡村间口口相传的自杀方式多种，种种皆精妙，种种皆要命。农民的自我意识觉醒，是有条件的。正如村民矛盾纠纷的产生，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苦，一要不穷，二要不苦，大抵就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基本条件。

这位村支书总结得很精到。

五、又是一个拔尖户

天色近晚，村里人纷纷荷锄回家。玉成和义成带我在村子里转一转，我提议，到一个最贫困的家庭里看一看。义成说了一家。

这一户共 5 口人，父母亲年迈，母亲残病在身，眼睛不大好使，估计就是老年性白内障。庄户人家生病，往往是扛一扛，实在扛不过去再说。儿子 30 多岁，从四川买了一个媳妇，但是媳妇却在去年跑了，留下一个小孩儿。现在祖孙三代住在三间窑里，儿子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亲和瞎眼的母亲，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这一户在村里最苦贫，我问义成，贫到什么程度？义成说：贫到瓮里挖不出米来。家无存粮，难度春荒。

我说，那也能算起账来的。义成说：算不起个账来。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用给他算账的方法，根本就无法给这户人家算账。

说着，我们循着村间小路一路走来，迂回曲折，竟能将一个村子都走遍。我们一边走，一边看村子的房子，全村的房子几乎都是老房子，墙上的颜色一律土黄，没有一百年的风尘吹拂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

但是，还可以看到几处齐楚的院落。石碓窑洞，砖洗门面，大门轩敞，看去气派，我问义成，这是什么时候建的。义成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他小时候就有了。像这样的院落错错落落的有好几进。村子的中心是戏场，戏台还是古时候的戏台，看样子像是清代的建筑，保存完好，我正要夸奖义成有眼光，古物保存得还算完好，但义成抢先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村里没有钱，要是有钱早就把戏台拆洗翻新了——穷村子，只能用这样的戏台！在他看来，不修戏台，他这个村支书极其没面子。我笑了笑，再没提这茬。

看这个村子的格局与房舍，至少在清朝中叶还是相当不

错的，到底是社会结构与人群活动的方式改变而一下坠入贫穷，还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了现在的面目？我心里一直疑惑。看那些旧房子，分明是过去在外做生意赚了钱之后回来修的，因为，在这些院落的设计上，至少不符合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的心理。这种衰落的村庄在山西沿黄河一带不在少数。

戏台周围自然是一个热闹所在，男男女女聚在这里扯闲篇，戏台对过还有一个小卖部，不见交易，却是有老的少的坐在台阶上，手抱着膝盖看周围有没有稀奇。没有什么稀奇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已经是黄昏时分，村子里依然黑黝黝的，已到掌灯时分，但村中几乎没有点灯的人家。

义成喊一个男人叫哥，那哥站起来，一身70年代极其时兴的劳动布上衣，方头环目，算是器宇不凡的人物。玉成说：这是树儿梁的拔尖户，原任村支书。名叫张兴田。

果然。

义成说：来了记者，到你家里坐一坐吧。

前支书眼珠不转地打量着我，我说我是随便来坐一坐，了解一下咱们种地的情况。

前支书一边站起来，一边直冲冲地说了一句：了解不了解，种地赔着呢！

随即邀我们到他家坐一坐。我们随着他一路走，一路说，说到村里的事情，前支书对现支书难免说一些事情。

他说：树儿梁村靠天吃饭，一遇灾年就没办法，除非将村子的人迁出一半来搞养殖业，否则没有其他办法。一半人打工，一半人侍弄土地，正好。

他说的这话有道理，无论是以树儿梁乡的土地数量还是从粗放经营的种植方式来看，这个村子只能容纳 200 多劳力，但剩下另一半人到哪里去呢？这恰恰是多少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城市人口就业尚难，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去抢城里人的饭碗，谈何容易。

他说：现在外出打工的人不少，我明天就要到五寨去做工去。这两年，重新走西口的人不在少数，过去是没办法的人才走西口，现在是翻了过来，是有办法有文化的人，才走西口。高中初中一毕业，就思谋往外走，一走不回头。

我理解，他这里说的“走西口”实际已经成为外出谋生的一个代名词。事实上，县境之内外出打工者很明显有两个走向，一个，就是传统的走西口，向内蒙流动；一个，则是向华北地区腹地或者更南的广东一带流动。而这两个流向则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重走西口路的无疑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另外一个走向则都是具有高中或者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后者虽然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但仍然是沿着“熟人网络”的脉茎四下呈漫射状流动或者迁移。因为，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河曲在外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日益增多，随着政府机构异地为官的干部调整政策而出调的本县干部越走越远，同学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乡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重新结成新的网络。本县政协甚至花费很大人力，耗时两年之久编纂了一本供老乡联系的通讯录。传统势力大，传统很具体。

他指着一进院子说，这院子的主人最近才将房卖了，举家出迁包头，一进刚刚盖起的新院子才卖了 2 万元。

那院子果然不同其他，五间石窑，砖包门面，角钢做骨，铁皮包面大门，院内果树花繁如雪，一派生机。

他说：近两年，农民变得会享受了，树儿梁村的闲人究竟还是不少，不思谋往外走，挣外边的钱，就晓得在家里喝酒。树儿梁村是两多，一是光棍多，一是啤酒瓶子多。多会儿这里扔一个原子弹，树儿梁人不吃亏——肚里吃上了嘛！

老支书一肚子牢骚。

依然是循着曲曲小路，到了张兴田的家。一进大门，就知道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农民。正面 5 间石碓窑，青石洗面，石工精湛，是 70 年代末期盖的。南面，又是 5 间线浇平房，是 90 年代盖的，院内开有小块地，植有果树。一个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下面是他家的收入情况：

张兴田，47 岁，妻子 43 岁。2 儿 1 女，大儿子已经结婚，在县水泥厂工作，但工厂不景气，今年生下孩子就上包头打工去了，和他们分开另过。其余一子一女读书。大儿子到包头投靠张兴田的三弟，张之三弟是 1996 年上包头打工，现在已经定居包头，是包钢轧钢厂的带班。

农业收入。

共种 8 垧地，所种地离家最近的 3 里，最远的 5 里（仍是以平常年景来计算）。

一、玉米，种 1 垧。

1. 投入：化肥（底肥）36 元，中途追肥 30 元，种子 30 元，耕地雇人 50 元，不用地膜，因为是坡耕地，用上地膜固然增加产量，但增幅不大，增产不增收，干脆不用。计投入

146 元。

2. 投工：耕种 8 工，锄地 6 工，收割 4 工，共 18 工。

3. 产出：1200 斤。2000 年近于绝收，只回收不到 20 斤玉米。颗粒未灌浆，猪都不吃。

4. 毛收入：每斤玉米 0.4 元，则得 480 元。

5. 工值： $480/18=26.6$ 元。

6. 净收入： $480-146=334$ 元

二、糜子，种 1.5 垧。

1. 投入：化肥 60 斤 41 元，耕地费 100 元。种子自留，不计，雇车运输碾打 150 元。计 291 元。

2. 投工：耕地 4 工，锄地 14 工，收割 4 工，碾打脱粒 3 工，共 25 工。

3. 产出：2000 斤。2000 年绝收。

4. 毛收入：每斤 0.4 元，共 800 元。

5. 工值： $800/25=32$ 元。

6. 净收入： $800-291=509$ 元。

三、土豆，种 1.5 垧。

1. 投入：化肥（尿素掺一点磷肥）64 元，种子 700 斤，自留占多半，配种少一半，有 100 元也就够了，耕地 100 元，运输 50 元。计 314 元。

2. 投工：切种 5 工，耕种 8 工，锄地 14 工，收获 12 工，共 39 工。

3. 产出：8000 斤。2000 年收获 1600 斤，不以此年计算。

4. 毛收入：每斤 0.2 元，则收入 1600 元。2000 年收成不好，仅卖到 0.15 元。

5. 工值： $1600/39=41$ 元。

6. 净收入： $1600-314=1286$ 元。

四、黑豆，1.5 垧。

1. 投入：化肥 59 元，种子 20 元，耕地 50 元，收获时或因外出做工或忙不过来雇人：20 元。计 149 元。

2. 投工：耕种 5 工，锄地 7 工，收割 4 工，碾打 2 工。计 18 工。

3. 产出：600 斤。

4. 毛收入：每斤 1 元，计 600 元。

5. 工值： $600/18=33.30$ 元。

6. 净收入： $600-149=451$ 元。

五、绿豆，1.5 垧。

1. 投入：与黑豆同。149 元。

2. 投工：与黑豆大略，但摘豆多加 10 工，计 28 工。

3. 产出：600 斤。

4. 毛收入：每斤 2 元。则得 1200 元。

5. 工值：每工时约 43 元。

6. 净收入 1029 元。

树儿梁村不种蔬菜，前支书张兴田介绍说，不种蔬菜的原因一是因为无水，二是因为地脉不对，种出来的菜纤维粗，不好吃。但在小块地上种一些耐旱秋菜，如萝卜、蔓菁之类，用于越冬腌菜。

那么，张兴田一家纯农业收入为 3609 元。8 垧地以 16 亩计算，则每亩纯收入 225.56 元。

工副业收入。

张兴田每年外出打工，因为做过村支书，所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往往受聘于工程队做领班和监工。每年外出约 150 天，好一些时候挣 3000 元，时多时少，有时候空手而归。去年差一些，除过吃住盘缠，拿回家里 1500 元。1500 元在村里也算一项大收入，即以工副业收入 1500 元计。

另外养猪 1 头，投入 500 斤玉米，甜菜、猪草等青饲料若干。产出 200 多斤肉，如此算来，则还可得 1000 余元，但张兴田说，猪肉卖一点，其实全家日常油呀肉呀全都自己用了，不应算在内。

张兴田一家全年收入 5109 元。以四口之家算，则人均收入 1277.25 元，接近小康之家。农业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约 70%。

全家支出情况。

1. 乡村两级提留：每人 50 元，5 口之家（养下孙子是农民，算 1 口）共 250 元。占到农业总收入的 7%。

2. 子女教育：1000 元。

3. 日常消耗粮食：15 袋白面，每袋 40 元共 600 元，大米 3 袋，每袋 50 元共 150 元。

4. 烟酒，张兴田平日节俭，待客用 5 元以上的烟，平时自己抽 1 元以下的烟，多数时候是抽自种自制的旱烟。500 元。

5. 婚丧礼金：200 元。

6. 电费：1 月仅费 7 元，共 84 元。

7. 烧炭：180 元。

8. 医药费：300 元。

9. 交义务工费：40 元。

9 项支出共 2704 元。年节余 2405 元，日常衣物开支亦不大，这样一苗葱，一棵蒜节俭下来，节余尚多。所谓“冒尖”，不过如此。

在统计时，我发现绿豆比黑豆值钱，是后者的 2 倍，为什么不都种成绿豆？张兴田说，一是因为绿豆比其他作物费手脚，一到成熟就自己开裂爆豆，二是庄稼人的东西，少了就值钱，一多就成害，绿豆行情好的时候可卖到每斤 3 元，但近年来不行，多数积压在家，而且绿豆在日常生活里并不是主要食品，吃得不多。而黑豆则可以换豆腐，做豆腐。三是种得粮食并不是都能换成现金，如果硬要以货币为单位来统计农业收入，这个收入也只是虚拟之数。种多种少，种什么，还取决于日常生活所需，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在够吃够喝的基础上才加以考虑的。那么种地的投资也就等于提前把买粮的款交了，花一些辛苦，刨闹一年的吃喝，在理论上打下粮就是钱，在实际上，用于交易的粮食少之又少。总之，地里是来不了钱的。

不愧是做过多年支书的人，他这一说，心里疑团顿时释然。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决定了农民的生存经济，所有一切农业活动，都以温饱为前提。

前任支书张兴田，25 岁做村里保管，算是村里的领导集体中层干部，后做民兵连长，再做大队书记、村支书，当干部年长，却也下过煤窑，曾是年轻人的领班，还在 70 年代领村中青年排过节目演过戏。看堂堂仪表，也像。

看到前后任村支书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我就问

他为什么不当村支书了。他说，一是自己年龄老化（？）脑筋跟不上形势，不适合当村干部。人一辈子有两个抗不过去的，一个是时代的进步，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是年龄的自然规律，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他说了一句民谣：

毛主席真伟大，
至死没见过大哥大；
邓小平真英明，
香港回归没去成。

这样伟大的人还抗不过，谁能抗得过？

二是当村干部为冤计仇，是得罪人的事情，现在的工作不像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一声令喝到底，没人听你的。所以，自己就主动退了。

我问：如果让村里人自己选自己的村干部，村里人愿意不愿意？

他说：当然愿意，但是你试试看，今天让选一个，是张三，明天让选一个，又变成李四，你敢一天选一次，他就敢一天换一个人——谁也当不住。

我问：农民的日子什么时候最好？

他肯定地说：1981、1982年刚“放开”时候到1985、1986年最好，那时候粮食值钱，而且打下能卖了，所以那时候是最好的。

乡村人的纪年标准，往往是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民间产生深刻影响的年代为准，因而这些民间口头的年代实际上是历史进程的准确年轮，同时也构成了评价是非的一个参照。比如，光绪三十年，本地遭灾绝收，饥荒惨烈，饿殍遍野，大

规模走西口谋生；民国十八年，是从来没有过的大旱；1958年大跃进，饿死人；1962年，粮价飞腾，公家人丢盔卸甲被压缩回农村；1981、1982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民间落实。等等等等。

他说：现在是最“灰”的时候，连续4年大旱，农民家里备荒的存粮已经吃光，外出做工的门路又少之又少。种什么不收什么，收什么什么又卖不出去。现如今种下一年地来，现金拿不到多少，刚够日常开销。要想见现金，只有外出做工。

而且“人气”也不如前十年好，村中不乏赌博吸毒等不法之徒，有的甚至以此为业，大都没有好结果，家贫如洗，好吃懒做，欠下赌账和毒资都纷纷出逃了。我问这类人大约有多少人？前任支书岔开了话题。

从张兴田家里出来，天色已经暗下来，山村的夜很静，但很黑，零零星星的有窑洞里射出的光，微弱而且孤寂。听说我要到那户“最贫穷”的人家里，前任支书张兴田很坚决地制止了现任支书：你怎么把人家往那里引？！

于是作罢。

六、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

专门去看望一个处在贫窘中的人，而且希望从贫窘的状态中做出什么文章来，其实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我在其他场合不止一次遭遇过贫困者那沉默得深不见底的眼神，他们沉默着，一双眼睛黑洞洞地就那样看着你，不是绝望，而

是隔膜，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心上同时承受着猛烈的击打。

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从张兴田家里出来的土埂下就是那一户人家，一个孩子在外边玩耍，因为天已经黑了，窑里还没有点上灯，整个院落也只能看见一些大致的轮廓。那个院子的石窑里头有三双眼睛，孩子一双，幼稚；老父亲一双，无奈；老母亲一双，却被岁月熬枯了。

我们4人一行从土埂上走过，却谁都没有说话，默默地注视，默默地走过，生怕弄出一点点动静，伤了那个孩子的自尊。

复又绕回村子的中心，张兴田说，贫说的是没有粮，穷说的是没有钱，贫和穷相因相伴，互为因果。年轻人没有勤俭度日的经验，以为天年常常风调雨顺，恰好80年代时候粮价也高，产一季卖一季，不晓得防范灾荒年景，这4年大旱下来，不存粮的人家大都陷入这种既贫且穷的境地。到外头打工，实际上也是挣一分吃一分，没有多少余项，满村子里的人，如果能平平常常用山药（土豆）糜米捞饭裹落下一年，就算不错了。

一遇灾荒，百业凋敝。他说起养猪的事情，去年天旱，忽然生猪价格大跌，导致了仔猪价格滑落，一直落到每只仔猪10元钱还没有人要，卖猪仔的人瞅谁家不关大门就给顺门缝填回去。今年养母猪的人少了，仔猪价格一路上扬，一直卖到200元一只。

十年九旱，整个农业体系是十分脆弱。

张兴田说完，要趁此空闲时间去加工粮食，就告辞而去。

来到村委会。村委会是70年代修的四五间窑洞，已经显得很破旧了。张义成建议我去看一看他们的村委会。先此，我已经从他那里获知，村里一年下来是没有多少积累的，我倒要看一看没有积累的村委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窑里有人，一盏昏暗的灯光下，有3人蹲在地上喝酒，一个戴眼镜的，义成介绍说是村里的副支书，副支书见郭书记进来，很热情地站起来迎接递烟，并且邀请我们也和他们喝酒。地上只有一包花生米，其他两人手里一人捏着一个撕裂口子的易拉罐，权做酒杯。义成大大咧咧地跟他们蹲在地上喝了起来，我和玉成两个人坐在炕沿上。

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在炕头兹兹拉拉地响着，图像忽而清晰，忽而就像一阵风似的飘走了。

村委会的窑里果然也像个村委会，墙上贴着各种表格，有很大一块版面是党团活动的组织机构及其内容，因为灯光昏暗，本想将上面的情况抄下来，但实在看不太清，只看见红的字，黄的字，绿的字，还有一面党旗的图案。

山区昼夜温差大，到了五月，白天的温度与黑夜的温度相差十几度。所以窑里还生着火，一床铺盖就放在炕上。义成说，副支书平常就住在这里，因为另外一间窑里是村里的代销店，并且他还兼着树儿梁村的信贷员，窑里有一只小保险柜。因为还有别人，我不便问及该村的信贷情况。

进来时看见的3个人中间，有一个浓眉大眼的男人，身边是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那男孩生得很秀气的样子，黑丢丢的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生人。这显然是父子两个。我们进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后生在劝说着他什么事情，让他想开些。

接谈之下，方知这后生叫做张吉雄，因为在沟里采石放炮，让公安局罚了1400元钱，支书张义成出面斡旋，才减至800元。因为石家庄靳如超爆炸案之后，国家对民爆用品加强了管理，他正碰在这个风口上了。

因为喝着酒，张吉雄的情绪显得很激动。他说，本来打石头就难，一个月的辛苦也挣不下多少，一下子罚没800元，我何年何月才能挣回来。不用炮怎么打石头？不打石头又怎么活？反正就我们父子两个，下一次再来罚，干脆让他们将我带走算了，坐上一个月禁闭，也正好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张义成一边和他们喝酒，一边就不以为然地说：那禁闭也不是白坐的，坐上一个月下来，饭钱也够你们父子下一个月的馆子。罚款还是上上之策，人是活的，钱是死的，还可以挣回来，何苦动不动就拿自己的命去赌。

玉成也说：听说县上要组织民用爆破培训班，你们去培训一下就能拿上合格证，有了合格证也就可以继续采石了。

张吉雄立即嚷嚷起来，说：禁闭不是白坐，培训也当然不是白培训，没有那么好的事情落在我头上。

张义成又是一番劝说，劝说也显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我却看见那孩子眼里分明地现出一丝惊恐。

接着，张义成转了话题，说张吉雄的信让退回来了。村里的信件一般都是由乡邮员直接送到支书家里，然后再转到村里各家各户。

张吉雄的眼神立即黯然失色，低下头，问为什么退回来。张义成告诉他信封上面写着“查无此人，退回”的字样。蹲着的几个人立即吵吵起来。

吉雄说：不可能的，怎么可能？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另一个说：你是不是写错地址了。

吉雄说：不可能的，地址我记得清清楚楚，不会错的，何况去年还能收到的，今年就收不到了？

人又问：是不是写错名字了？

吉雄思前想后，说不可能的，她叫张述平，身份证上也是这样写的。

吉雄说：即便她收不到，她哥也应该收到的，怎么会查无此人？

一群人就这样议论着张吉雄这封信被退回来的因由，但是最终也没有搞清楚，还是义成总结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是退回来了。

原来，张吉雄父母双亡，在8年前买了一个四川姑娘做了媳妇，那姑娘叫做张述平，据说长得很漂亮的，一年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5岁的那一年，媳妇张述平提出要回四川老家探望父母亲，张吉雄答应陪她一起回去。

但是，村里人劝张吉雄，千万不能让她回去，这一回去可就回不来了，村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张吉雄认为女人已经为自己栽根立后生下儿子，儿子是一根拴魂绳儿，她没有不回来的道理，更何况，他们在婚后确是男耕女织甚为恩爱，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张吉雄一家三口不顾村里人的劝说，车船劳顿，一路奔四川而去。

过了一个年，村里人却看见，张吉雄带着5岁的儿子孤

零零地回到树儿梁。那四川媳妇一回四川就不见了踪影，给他留下话说再也不来这焦苦的地方，已经动身到深圳打工去了。

现在，儿子已经8岁，去年上小学，但是媳妇还没回来。张吉雄死也不相信这是真的，3年多来，写了好多信，浓浓的思念通过那一封封信跨过黄河飞到巴山蜀水之间，但是，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吉雄说：她不想我罢，她不想儿子？

是啊，她难道就不想儿子？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凄凉的故事。一个大男人单独带着儿子，既不能外出打工，身子也贴不到地里，父母双亡，没人给孩子做饭，他是既当爹又当娘，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只能在平常靠打石头挣一些现钱。

多少年后，可能会在孩子的某篇作文里出现这样一个吃苦耐劳的伟大父亲，但是，在我面前的却是深深地陷入思念之中的张吉雄。

我想，他一定知道这种期待注定是无望的，或者说他对生活所有的期待就在无望的期待之中，与其说是思念，其实无异于自虐。

我们要告辞了，张吉雄还送我们出来，我说：赶紧回去给孩子做口吃的吧。

他艰难地笑着答应，挥挥手与我们告别。

回到支书张义成家里，义成从窗台上取下一叠子信，拿出那一封被退回来的信，就着灯光，看到是一封挂号信，上面有当地邮局的说明：本人拒收，退回。我奇怪张义成怎么

记成了“查无此人”，张义成拿过信指给我看，果然在封皮上面有一行油笔写的字，“查无此人，退回”，笔画横平竖直，一看就知道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基本可能断定，这行字迹恰恰出自那个叫做张述平的女人之手。

那个张述平岂止实有其人，还亲手将这封信退到了邮局。

义成说，树儿梁村方周二围四村八寨均有买四川女人的事情。一村平均十三四个，树儿梁村一共有十二个，但是现在跑得剩下两个，其他村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些四川女人大都是人贩子贩上来的，好一点的三五千，差一点的一两千就可以买到。

凡是离开的女人，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确实上当受骗被拐卖而来，出于无奈才下嫁本地，但本人并不愿意，这一部分妇女全部被公安机关解救返乡。

另一种情况，卖者恰恰是被卖者本人，自己卖自己，其目的无非是想捞一笔钱，然后逃走。这一部分妇女，几乎在原籍都有家庭，到北方来做媳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所谓“放鹰”。树儿梁某村一个农民曾买一贵州妇女为妻，中途逃走，他千方百计打听到该妇女的情况，到了贵州一看，家里丈夫孩子齐全，人家并不向他隐瞒实情，还待他很好，原来的丈夫甚至天天陪他喝酒。他看是这一种情况，觉得没有意思，就回来了。

留下来的少数妇女，一是既然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家庭，而且也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家庭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对丈夫及家人比较满意，不愿意再离开。另外一种情况是属于“自找对象”，也就是自己相中的。这里的

农民，娶四川女人已经成为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渠道，不通过人贩子就自通门径，三五成群到四川“引老婆”，凡是引回来的老婆一般是“保险”的。

义成举了一个例子。树儿梁村农民张某，现年35岁，当年随义成的岳母回川，通过其岳母说了一个姑娘做媳妇。当年张某身强力壮，16岁在家里扛大梁，农活也干得，煤窑也下得，什么苦都吃得，但是，去年得了脉管炎，治不起病，再也下不成窑，几乎丧失了劳动力。这个四川媳妇就没有走。其原因据张义成说是：她自己相中的男人，不属于强迫性质，有什么不满意的？现在，这个家庭全靠这一个四川女人支撑着。

义成说：四川女人真能受，种的地只嫌不够，今年又额外拨给一些地，全是一个人在地里忙。

义成说：一般情况下，只要娶回媳妇来，不管户口来不来，一定优先拨给土地——为的是能让女人留住，保全一个家庭。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对待贩卖人口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

对于从四川贩上来到村里“做媳妇”的女人，村干部一般都持着这样一种态度。90年代初期，在全国性“打拐”专项行动中，在邻近的偏关县某村曾经发生过集体对抗事件，举村老少持械与前来解救被拐妇女的军警对峙，并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

树儿梁村自1994年以来，只办过一件喜事，连续几年娶不回媳妇来。正如张兴田说，树儿梁村一是光棍多，二是酒瓶子多。

光棍多和酒瓶子多难道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不言而喻。

四川与山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当年，大

批晋绥干部入川，执掌四川等西南各省基层政权，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这一背景是不是与近年来拐卖四川妇女入晋有关系？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一背景为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些便利。历来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迁移，除了政府强行迁徙之外，几乎都是循着“熟人网络”完成。至少，一个事实是，近年来发生的恶性拐卖四川妇女的案件都发生在山西或者内蒙地区以及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晋语区。

入夜，有一老者在支书家里等支书说话，坐在墙边的小凳子上，规规矩矩，这时候张义成正张罗着为我和郭玉成烧炕，他的妻子张罗着为我们做饭。张义成被烟呛得满眼流泪，进来问老者有什么事情，老者说：想再分一些地。

他们出了院子，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估计村支书的手里一定有一些机动地。正像支书说的那样，是准备随时分给那些添丁进口之家的吗？

前任支书张兴田一会儿也来了，在义成家里等从五寨来的电话。一会儿，电话来了，商议好，第二天一早，张兴田要带本村人马二十名开赴工地。

夜里，支书家的那只猫下了 5 只小猫崽，睡觉时让女儿压死一只。说话中间，我说城里的猫很贵的，可以卖些钱。义成说：猫狗顶一口人呢，谁卖谁倒运。何况，这些猫在未出生前早已经许出去了。

树儿梁村四五年只娶回一个媳妇，而树儿梁村现在却要多四个猫儿。猫儿已经多起来，媳妇会多起来吗？

面包会有的，一切未必都会有。

晚饭安排在支书家里。

其实下午我们一来，义成和玉成就商量晚上的饭如何安排。吃什么肉，喝什么酒。包什么饺子，剁什么馅。我和玉成都说简单一些，饺子就不必包，上一盆酸饭就行了。义成却说农家的土饭是无论如何都端不上来的，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之下还是同意了。他还是骑了摩托车到乡镇府那边买了一包刚出锅的肘子肉。

酸饭是家乡一带的特殊饭食，农民一年之中有半年三顿都以此为主食。就是将自产的糜子米经过发酵然后下锅煮，捞出来叫捞饭，径自熬煮之后称为酸粥。关于这种饭食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当年迎候李闯王过境，乡民纷纷淘米以备大军食用，但是李闯王临时改变行进路线，直奔居庸关而去，乡民们在失望之余，不忍心将米扔掉，只得煮出自用，不想那饭竟很可口，于是酸饭在我们这地方一直流传下来。

这种说法当然反映着十分深刻的民众历史情绪，但多半不能坐实，这里头需要调动的偶然因素太多了。而真正产生的根源，怕还是自然环境的一种选择。此地十年九旱，水缺如油，为了抵抗难耐的干渴，生出这样的法子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十点半，义成收拾了饭局，安排我们就寝，他的夫人到外边找地方睡去，我们三个男人睡一炕，脚汗臭气了也顾不了许多。早早睡下，是因为义成的女儿明天还要上学，须每天五点钟起床，吃过饭，六点钟就出发，步行3里，才能到达设在原乡政府所在地的学校里去。

乡下孩子读书辛苦如此。

乡下孩子也只有通过辛苦读书一途，才可以最终出人头

地。

睡之前，张义成给我谈起了一件事。过去的洋教（听他叙述像是天主教）以极其原始的传教方式渗透到山庄窝铺。那个患了脉管炎的张某卧床不起之后，有传教的人就找上门来，说信了教，主就会保佑你身体好起来的。

我问：他信了没有？

张义成说不知道信了没有。但是村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有信教的。这些人信了教之后，单是不打人，不骂人，见人有礼貌，再没有其他变化。

义成家里的电视闪闪烁烁却也能收十几个台，我问义成村里人拥有彩电的数量，他说彩电有三两台，下来全是黑白电视。还有没有电视的人家。

窗外繁星点点，天空深邃不可测，有一种说不清的神秘之感。

七、在乡府

5月5日，按照行程安排，到原乡政府看一看。

在支书义成家里吃过早饭，我到村子外面转了转。清晨的黄土高原天清气朗，山沟沟里面还隔三岔五开着桃杏花，太阳升起来，阳光透过澈明的空气铺天盖地地倾泻而下，用不了多大工夫就感觉到灼热的气浪阵阵袭来。

降水少是干旱的直接原因，但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是更主要的原因。地表植被稀少，附近又无成片森林调节气候，高蒸发量的气候成为整个黄土高原显著的特征。这样，周边城

镇里下水设施极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垃圾基本靠风刮，
污水基本靠蒸发。

坡底，一个老农用肩膀拖着很长的耙子在一片“挂起来”的地上耙地。这片地大致呈狭长菱形，坡度在 40 度以上，牲口根本立不住脚，只能人工耙地。耙地一是为平整土地，二是为保墒。但老农拖过之处，后面则溅起一片烟尘，根本无法下种。

老农已经 64 岁，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子女们全都出外打工谋生。这片不到 1 亩的坡耕地准备点种黑豆。

以温饱为前提的生活所需是种植品种选择的标准。在离开树儿梁村之前，村里卖豆腐的一位妇女送货上门，义成的妻子到储粮的窑里挖来一小钵黑豆，卖豆腐的称过，就放在秤盘里，就那样再端着回去。村中这类交易依然保持着以物易物的形式，1 斤黑豆换 2.5 斤豆腐。在蔬菜相对短缺的山村，豆腐是每天必需的高蛋白营养品，而 1 斤黑豆可产出 3 到 4 斤豆腐。出豆腐的多寡，视做豆腐人的手艺而定。

义成介绍说，村里共有 3 家这样的卖豆腐户，而阖村一天只能消耗一家所产出的豆腐，这样，3 家自行协商，轮流来做，平时每家 1 天，逢年过节 3 家同时经营。

这是村里惟一的能常年坚持下来的经济个体，虽然以物易物，但获利相对可观。村委会原来设有一个代销店，但人们平时手中无现钱，常常是赊账经营，本小利微，资金年周

转还不到一次。村里还有一家个人开的小门市，烟酒糖茶，规模不大，但也常常是赊账经营，情形也差不多。而买日常所需的白面大米，也往往是用自产的粮食沿袭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回。

村里有一个医生，是树儿梁乡镇医院的大夫，上班到医院，下班回家里，村中人大病小灾不用出村就可解决。但在出村的路上，玉成说村里人即便看病抓药也大都是赊账，到年终有余钱时再还上。

村中交易情况大抵如此。

上午9时许，我们到了乡政府。

乡政府与其他山区乡政府的面目大抵相同，石料碴就的石窑，上下两层，但绝不是楼房，而是因地势不同形成了楼房的格局，上一层的院就是下一层的窑顶。尽管乡政府已经撤销，但是乡镇政府各办公室的牌子还挂在一间一间窑洞的门口，上层曾是五脏俱全的党委政府办公地点，下层是信用社等县直单位派出机构。临街还是一排石窑，一连开着两个比较大的百货门市。乡政府处在整个河沿的尽南端，北侧依次是农机站、医院和学校。

乡政府原来有一部电话，电话线现在却已经被铰断，这显然是乡政府撤销之后的结果。玉成说，这条电话线扯进山里后，只安了一门电话，原乡政府干部每人发一张电话卡，限额限量，打完为止，所以利用率极低，乡政府撤并之后，欠了两个月的电话费，被电信部门给铰断了。因为要联系下山事宜，我们只得到临街的门市里和城里联系。这部电话与张

义成家里的电话一样，同样是无线长波送话。

我顺便了解了一下这里的商业经营情况，开门市的小老板告诉我，进货大抵是日用百货，但资金周转率不高，估算下来，一年周转一次不到。我问他门市开办的资金，不知道是不愿意告诉我还是真的不知道，他答不上来。但我看了看商品，按进货的大类分开，耐用消费品不多，以日常生活的易耗品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逢年过节和婚丧大事的大宗消费肯定不在这里。这样，总量至多不过三万元，大致也可以看出这里的消费额度。

电话打一次八角钱。这是树儿梁通往外边的惟一信息渠道。

乡里有通县城的个体小公共汽车，早晨 7 时出发，下午 5 时返回，一日往返一次。

毕竟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而且刚刚撤并，所以还可以见到从周围村里下来一些农民来这里购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但因为是农忙季节，也就显得冷清一些。

原乡政府的办公室都锁着，玉成说，大部分办公用品已经并归到刘家塔镇，里面也没什么看头，但是乡信用社还正常办公营业，我们径直到信用社主任的办公室。

信用社主任见了玉成，显示出久别后的亲热，并十分关切地问玉成将来的去向，感慨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呀，前年落在乡政府大门墩上的一粒杨树籽居然发芽成苗，不浇不灌今年还活着，乡政府就一下子让撤并了。

信用社主任介绍说：树儿梁乡共 5600 多口人，1470 户，存款共 600 万，人均 1070 元，信贷规模在 240 万到 250 万之

间，大部分用于春耕生产，其中还有 100 多万扶持原乡属煤矿的建设，但信贷质量很低。信用社共 2 人，乡政府撤并之后，虽然对信贷没有什么影响，但看样子也将随着乡政府的撤并而取消。

说到信贷质量很低，就说起最近几天乡属煤矿承包者的一件事。

树儿梁村张义成在 4 年前就为煤矿的坑口推了土方，煤矿承包方欠资 1 万多元，时至今天，一分未还。前月，张义成到煤矿讨要欠账，不想与煤矿承包者发生口角，煤矿承包者受伤住院，到今天也未出院，单说头晕。张义成说当时的情形是承包者自己一头撞向衡器，以死抗债，“想讹人哩嘛”，而承包者则一纸诉状将张义成告上法庭。这个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煤矿承包经营者欠账不还这个事实。用工工资尚且拖欠，信用贷款就可想而知了。

随后，我们又去了学校。树儿梁学校的建筑类似乡政府，新旧建筑夹杂，窑洞显然是 70 年代的建筑，而线浇单片楼则是 1998 年盖的，质量不错，故全做教室。

玉成介绍说，树儿梁中学（初中）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每年的升学率和教学成绩在全县同级中学中数一数二，是一所寄宿制初中学校。

学校秩序井然，教师们都是一水儿的大专毕业生。河曲县的教学质量在晋西北周边县份算是最好的，升学率连年居高，毕业回县大学生人数随之逐年增加，大中专学生就业的压力一年重似一年，许多大学生不得不安排在乡属中小学校。这些从大中专学校毕业的教师的到来无疑提高了山区学校的

教学质量，但是，辛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还是回城，而且，教育主管部门也确实有这样的鼓励承诺。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激励链条：教师们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将来就可以挣脱祖祖辈辈的生活轨迹，教育部门又鼓励教师们好好工作，在不远的将来则可以离开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教师和学生都奔着同一个目标而来，师生同气，书声朗朗，歌声嘹亮，国旗招展，攒足了劲头，随时准备突破重围向城市一路冲杀过去。在校园里多少能感到这种悲壮的气氛。

教师们都不是本地人，都需住校，尽管学校的条件已经算不错，但住宿条件仍然显得局促紧张，教师们只好 3 人一窑，住宿兼办公，一条炕上 3 卷铺盖，地下 3 张办公桌，挤挤挨挨满满当当。副校长郝老师 28 岁，夫妻同校教书，只有在星期天同事们回家之后才可以住在一个屋子里。结婚多年，形同分居。

教师工资原来由乡政府统筹，但是乡政府财力不足以维持，工资发放由县里收回，一般讲，教师工资或有拖欠，却跟一县干部同一标准步调一致。所谓同一标准，即县里干部们欠多少，教师们也跟着欠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偏谁袒谁。但是，郝老师说，目前还欠着 1998 年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是为什么，郝老师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每任书记交接的时候，总要出现这样的纰漏。

在学校和乡政府之间，是一口井。就是那一口每油桶水卖到 5 角钱的水井。这是一口深井，深度达到 300 多米，须用大功率潜水泵方可提上来。树儿梁村在沟底曾经有一口深

井，过去由乡政府花钱为附近村民提水，但因为距乡政府较远，管理起来不大方便，在 2000 年又在乡政府所在地打了深井。乡政府所在地地处谷底，是理想的钻址——果然，探到了出水量极大的一股深层地下水源。

山区缺水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尤其连续四年大旱下来，山间小泉小水几乎全部枯竭，人畜饮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找水，解决水荒成为当地压倒一切的大事。每到一处村落，总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标语：

解决人畜吃水，造福一方百姓。

户均一座蓄水窑，大旱之年心不慌。

打起一座蓄水窑，顶如一个担水儿。

筑起三道防线，解决人畜吃水。

.....

水荒之烈，历历在目。缓解水荒，解决水荒，成为县乡两级政府和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所谓三道防线，指的是平均每一乡镇集中打一深井，供乡民常年饮水之需，每村筑一大型蓄水窑，以解决灾年抗旱之需，每户补贴若干现金，在院落内筑一小型密闭蓄水窑，以解决大牲畜吃水之需。县里干部对我说，三道防线应该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荒。但细究起来，这“从根本上”四字显得底气不足。水荒说到底还是生态失衡的恶果，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方法还是改变周边的生态环境。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努力。

这本来不是我此行所要发的议论，但是，改善生态环境，

加快植树造林，是整个北中国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话题。深层地下水固然可以地上补充，而如若地上植被稀少，涵养水份能力势必很差，其地上补充能力就可想而知。

回到原乡政府，碰见一位李姓老者。李姓老者对乡政府被撤极不满意。给乡政府做豆腐是其日常生活用度的主要来源，乡政府撤并之后，这一来源被无情切断，好在他还养有一口臊猪，经营配种业务。该老者早年丧妻，单留一女，后来招女婿上门，主要农活由女儿女婿操持。今年，女儿女婿上了内蒙，地里的活就落在外甥身上。家里的事情他并不多管。

老者在乡政府已经呆了三十多年，因此对历任书记如数家珍。树儿梁乡建国五十年来，平均每五年换一任书记，近两年来调任较为频繁。几任书记中，现居副县（处）级领导职位者两名，其余各任书记，或回县直局办担任闲职，或调任他乡仍然担任乡镇书记。

又说起了那一条坝。

此坝建于70年代中期，数九寒天，冰冻三尺，树儿梁各村全体动员，自带干粮，男女老少齐上阵，奋战一个冬天筑起一条石坝，但第二年雨季被冲垮，当时的公社书记尚且年轻，望着被冲垮的坝梁大放悲声。雨季一过，复又动员全公社十数村农民重筑土坝，采用水力冲淘技术，坝体因而坚固，至今岿然不动。

老者说着，仿佛回到那个呵气成霜的大冬天，情感深挚。

一所寄托着生活全部希望的学校，一口活命的井，一条要命的坝，便足以构成一个乡政府存在的全部理由。

八、一张令人晕眩的礼单

信用社主任骑摩托车到冯家庄办理春耕贷款回来，紧锣密鼓开始安排饭食。乡村社会里的交往形式，最终往往要落脚在一个吃上。而除了吃，确实再也找不到其他更为隆重的表达方式。

说起吃饭，就说起那个做饭的师傅。其理由是阖村里找不出那样一个“苦命人”。历来上级下乡，便是访贫问苦，将党的温暖洒遍千家万户。

其实，我并不乐意将极端贫困的特例作为一般典型进行分析。了解一个地方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只能从常态的生活入手，才能得出较为接近真实的结论。在极态中得出的结论，肯定有着浓烈的情绪化色彩，而在极态中形成的决策，为害甚深，我们不是没有领教过。

但是，我不好拒绝主任的一番好意。且听其宣讲一篇《苦命者说》。

做饭大师傅张某，树儿梁乡冯家庄人，现年 38 岁，高中毕业，3 个女儿，1 个儿子。其妻是通过妹妹换亲所娶。乡政府撤并之前，月工资 200 元。从小没娘，由爹拉扯大。3 年前，女儿忽然生病，在乡医院抢救过程中夭折。自此得了头疼心慌之病，一旦犯病，则以头撞墙。不久生下儿子，儿子一遇头疼脑热，必然车马劳顿下到县医院诊治，死活信不过乡医院的水平。两年前春耕的时候，自己养的一头毛驴从坡上摔下跌死。去年，大家看着他可怜贫困，将一座大型水窑的建

筑工程承包给他，水窑将成，其妻不慎掉到水窑底部，当场死亡。

穷达憎命，自古而然。深山出俊鸟，逆境产人才，古训谆谆，却已经将深山逆境归为目的。为深山而刻意深山，为逆境而颂赞逆境，深山逆境仿佛是天堂一般美好，深山逆境为道德所认可，其荒唐逻辑不言而喻，在我们民族的心理中，对逆境有着近于病态的迷恋。与其将一个人的不幸遭际归为不可看见也不可抗拒的“宿命”，莫若说其不幸的遭际究竟还是可诅咒的周遭环境与客观条件的产物。

做饭大师傅张某之兄，其婚姻结构也同其弟一样，是通过换亲完成。“换亲”和“转亲”是穷困山区普遍采用的一种婚姻形式。换亲是在两户男女之间展开，甲户之女须嫁于乙户，则乙户之女必须反嫁到甲户；转亲则在三户以上男女之间展开，甲户之女嫁于乙户之后，乙户之女嫁到丙户，而丙户之女循环嫁到甲户，三对或三对以上男女的婚姻就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完成。这样的婚姻形式，双方或三方可免除繁文缛节彩礼花费之苦，固然是穷困之下的无奈选择，却不期然间带上了浓浓的买卖婚姻的色彩，其带来的婚姻不幸数不胜数。

张某之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夫妻感情不合多年，因而没有产出一男半女，村里的人甚至村干部很为他们着急。许多年前的一天，夫妻俩扭打在一起，情急之下，张兄的裆下被抓破，当场昏厥，解决夫妻矛盾的契机因此也跟着到来。人被抬到公社医院，公社干部对女方说：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是坐监，因为已经构成伤害罪，二是好好过日子，则可免除

牢狱之苦。乡间拙妇没见过大阵势，惊恐万状之下自然而然选择了后者。

乡村社会的“人治”特点在张兄的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自此之后，夫妻双方感情似乎好了起来，证据就是事发不久，妻子怀上身孕。十多年后，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如果不是两个儿子太过聪明，那么张兄大约很快会过上另外一种幸福生活。不幸的是两个儿子初中毕业之后同时被五寨师范录取。

大中专学校在“并轨”之后，收费陡高，师范院校也不能免，据说是顺应着教育产业化的潮流。两个儿子同时被录取，这就意味着张兄须一年拿出 8000 多元钱来培养两个儿子。8000 元钱对于只知吃苦下力的张兄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东告西借，借遍了所有的亲戚，仍然不足以凑够一个儿子上学的费用。最后决定，让大儿子上学，小儿子回家种地。学校开学的那天，他怀揣着尚有余缺的学费，将儿子送到学校，先找到校长，近一个月东奔西走告债的煎熬硬能将一个农民的脊梁压弯，他给校长长跪下去，央告校长将他儿子收下……

苦命者果然命苦，一窑人听完都不胜唏嘘。

乡政府撤并之后，张师傅同李老者一样，一下子失去了依托。现在信用社将他雇下来做饭，一月不管吃住 120 元，下来再派些杂活，零零碎碎一月下来也不超过 200 元的样子。

通过人贩子买四川女人，换亲，转亲，两天来这些非常态的婚姻形式一直在耳边挥之不去。而且每每谈论起这个问

题的时候，所操作的语言也格外显现着婚姻大事在乡间的严峻。比方说，他们将未婚称为“没娶过”，已婚称为“娶过了”，而无力完成此者则为“娶不过”，都带一个“过”字，语言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令人深思。婚姻是生活的一道坎，从人生的意义上来说当然如此，但是，言语之间所指却分明与此毫无关系，或者说更为严重一些。

郭玉成主席多年乡镇工作，乡村礼俗稔熟于胸，李姓老者平时又给人说媒，算是一项副业，信用社主任多年经营全乡银钱，对每家每户的家底一清二楚，还有一个前乡政府的电工，也已经快到儿婚女嫁的年龄。几个人凑在一起，将要娶回一个媳妇的各个细节逐一罗列，一份详细的礼单就列了出来。

结婚礼单：

一、彩礼：一说财礼，指男方给女方家中的礼金：8000元，但这是平常之数，大家说，就是女方不做声也得那么多。多数情况是10000元，即以10000元计。

二、给女方的礼物：时下流行“三金一木兰”，三金是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木兰指木兰牌摩托车。折价8000元。

三、家用电器：彩电、冰柜（不是冰箱？）、洗衣机。折价4000元。

四、家中铺排（一）：沙发、组合柜、收录机（有的要VCD）、手表。折价2500元。

五、家中铺排（二）：煤气灶柜、地毯，折价1800元。村中新房有炕，炕上多铺地毯，故。

六、家中铺排（三）：四铺四盖。即新被褥一袭四套，以

现行棉花价格计算，计 800 元。

七、新衣裳：5000 元。

八、订婚之后过节之礼，共四节，清明、七月十五、八月十五、过年。每次折价 150 元，共 600 元。

九、村中唱戏，需给女方看戏钱：一次 50，一年 2 次，共 100 元，乡镇起会，需出赶会钱：200 元。两项计 300 元。

十、订婚换衣，包括内外衣、羊毛衫、皮大衣等，折价 1000 元。

十一、订婚时到女方所费礼金，此花项谓“认大小”，包括给岳父、岳母、未来兄嫂等买衣物等项，折价 800 元。

十二、订婚大送，即婚礼前夕往女方家送的“大礼”，是谓“大送”，计“八个八”，包括：大米 8 袋，白面 8 袋，猪肉 80 斤，胡麻油 80 斤，酒 8 瓶，烟 8 条，水果糖 8 斤，白糖红糖合 8 斤，折价 2124 元。其中，酒需是 10 元/瓶以上之酒，烟需 50 元/条之烟。此项礼为纯礼仪性质，男方送毕，女方回送一半之数，以 1062 元计。

十三、娶女羊：300 元。

十四、婚礼女方收新衣裳、置化妆品：折价 1000 元。

十五、娶亲时给女方家长“离娘肉”：折价 250 元。

十六、娶亲回来时女方换妆，包括内外衣，折价 250 元。

十七、婚宴：乡间自办婚宴一席 5 人方桌，计 20 桌，前后 3 天，共需 60 桌。婚宴摆席需如此计算，所费与客人礼金相抵之数是实际消耗之资。但随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乡间宴席水准也随之提高，礼金却是礼尚往来，甲娶亲时是十年前，乙记礼金为 3 元，十年后，乙娶亲时，甲亦复计 3 元，乡

间礼往，常常如此，故婚宴礼金不能与客人礼金相抵，每桌约需 30 多元，以 2000 元计。

十八、娶亲所雇车马费：200 元。

十九、谢媒人：200 元。

共计 40062 元。

数字合出来，众人长长出一口气，仿佛自己亲历了这样一场漫长且熬人的婚事，纷纷说，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数，但略少了一些，因为还有一些数不上来的开支。而此单中所列诸项，办事时必须一步到位，哪怕有细微的差池，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比方说，女方迟迟不打发迎亲队伍，媳妇娶回来之后，迟迟不下车等等，其中曲折，只有当事人才有深切的体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这个过程中，名目迭出，花招使尽，令人心烦，为日后的家庭矛盾埋下伏笔。

文学家、理论家多认为人情浇薄乃是城市化的结果，其实只要在乡间深入体察一番，就会感到，这恰恰是乡村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所结出来的恶果和毒瘤。而在乡间人情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熟人社会，更是如此。而一个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程度的高低，恰恰要看这个社会公众生活的规则和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将“人情”二字压榨出去。

信用社主任说，4 万多元仅仅是一场婚事的直接花销，除此之外，家中有房是女方很一般要求，这也是婚姻的基本条件。那么，在谈婚论嫁之前，男方家长还得给盖至少一间做卧房的窑洞，一间供做储粮放物的窑洞，每间窑洞以 3000 元计，则至少须 6000 元。因此，婚事在即而没有盖起房的，女方往往提出要提前将盖房起屋的资金备齐，然后随彩礼一起

送至女家，是为盖房抵押。数目不等，最多 2 万元。

而嫁女一方，也同样耗费不少。时代昌明，过去赤裸裸地依靠卖女儿发财的财迷大约只能埋在意识里不能明言。要说男方所出巨资都给了女方家长，这完全不是事实，举例而言，彩礼一项表面上全部给了女方家长，可大部分家长都用此来给女儿作了陪嫁，有时候，陪嫁所出远远大于彩礼之入。但大致说来，女方的负担要比男方负担轻得多。

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

都被繁缛的礼仪“洗”掉了。一个农民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都需通过礼仪来完成，不可不慎。一方面，要通过礼仪来体现价值，另一方面，体现价值的礼仪又将农民折腾得微如草芥。说起来，多少有些悲壮。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民为儿子办一场婚事，几乎将一生的积蓄全部用上，养老、医疗的费用就根本谈不上了。树儿梁乡的计划生育状况相对好一些，年轻人至多要三个孩子，一生男孩，立即打住，这种生育状况是不是与一场婚事那样庞大的开支有直接关系呢？

信用社主任说：当然。

李姓老者面对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数字好像有些庆幸，5 年前，他给自己的外甥娶媳妇，只花了 2 万多元。

他怅然地说：看电视上播的节目，世界上好地方多的是，咱祖宗咋就把咱生在这穷沟沟里呢？

老汉或许是此时此刻才有如此疑问，但是，他已经是 73 岁的老人了，73 岁的老人被生活压得愁眉苦脸。窗外黄土漫漫，沟沟岔岔曲折掩映，一如老人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一波一

波地漾开去。

九、农民最怕什么

树儿梁乡政府撤并之后，所有人员一例都归并到刘家塔镇。但因为原来一些县直派出机关还没有明确的归属，所以信用社、邮电所、供销社等等机构还存在着。管理全乡用电的线务员张忠泰也仍然忠于职守，留在原乡政府。

张中泰，原树儿梁乡冯家庄人，初中毕业，39岁，妻子38岁，3个孩子，其中1个男孩。大女儿19岁，在一所中专学校学习口腔专业。月工资420元。加上父母亲，家里共8口人，除他一人之外，全部为农民。

在过去，随他这种身份，他的家庭属于“市属户”，在乡村里应该是被人羡慕的一种家庭结构，一方面，有工资收入，月月见现金，另一方面，家中有地种，日月用度因而就少得多。

趁未开饭这一段空闲，我给张中泰算了一笔账。

农业收入。共种20亩地。

一、糜子，4亩。

投入：化肥200元，青肥不算。耕种雇人牲口80元，碾打运输雇工20元，共300元。

投工：耕种2工，锄地16工，收割4工，碾打运输3工，共25工。

产出：去年，1600斤，值640元。

工值：约25元。

净入：340 元。

二、玉米，2 亩。

投入：化肥 100 元，种子 15 元，雇人耕种 40 元，运输 40 元（最远的地距家 2 公里）。共 195 元。

投工：耕种 1 工，锄地 8 工，收割 4 工，脱粒 4 工，运输 1 工，共 18 工。

产出：1120 斤，去年玉米稍微减产，卖到 0.35 元/斤，共值 392 元。

工值：约 21 元。

净入： $392 - 195 = 197$ 元。

三、黑豆，4 亩。

投入：化肥 65 元，种子忽略，耕种雇人 80 元，运输 30 元。共 175 元。

投工：耕种 1 工，锄地 12 工，收割 16 工，共 29 工。

产出：500 斤。值 500 元。

工值：约 17 元。

净入：325 元。

四、土豆，7 亩。

投入：化肥 385 元，种子 200 元，耕种雇工 140 元，共 725 元。

投工：耕种 7 工，锄地 12 工，收获 52 工。共 73 工。

产出：10400 斤，每斤 0.15 元，值 1560 元。

工值：约 21 元。

净入：840 元。

农业总收入：1702 元。

除去乡村两级提留 320 元，净入：1383 元。

工副业收入。喂 2 口猪，养 5 只羊。

一、生猪：投入买仔猪 150 元，喂 500 斤玉米，值 200 元，土豆 3000 斤，值 450 元。卖生猪所得 700 元，净亏 100 元。

二、羊：买 5 只，共得 1000 元，投入 240 斤粮，共 96 元。由老父亲常年放养。净得 904 元。

三、在外揽一些电工活，去年共得 500 元。

工资收入：5040 元。

三项相加：张忠泰全年总收入为 7727 元。农业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约 17%。

生活开支：

一、煤炭 280 元。

二、电费水费 150 元。

三、白面 10 袋 400 元，大米 6 袋 300 元。共 700 元。

四、蔬菜肉食 1500 元。

五、礼 300 元。

六、子女教育：女儿一年花 5000 元，两个上学孩子 2000 元，共 7000 元。

七、医药费 800 元。

八、家里买衣服 1000 元。

九、烟酒 720 元。

十、摩托用油 700 元。

共需开支 13150 元，全年赤字 5423 元。其中子女教育是一大块，占到全年开支的 53% 多。

算完这笔账，我有些疑惑。一是树儿梁村 2000 年的庄稼

几近绝收，隔沟相望的冯家庄却还有收成。二是张忠泰一年过下来，一下子赤字 5000 多元，就是放在城里一个普通干部头上也不可思议，不能承受。

玉成说：树儿梁乡属于黄土丘陵地带，沟壑纵横，气候不同，也就是小气候现象在起作用，因之全乡受灾，各村却程度不同。黄土丘陵地带的作物，是经过农民几千年来选择淘汰下来的耐旱作物，吸水量只要能吸收正常吸入量的 30%，就可以确保生长无虞，因此，表面上各村降水量之区别也不过 100 毫米之差，但体现在作物生长效果上却大不相同。

玉成一席话，我感到非常震惊，支撑整个脆弱的农业体系的，是如此顽强的植物。而如此顽强的植物生长的大地和天空却是如此地吝啬。我仿佛置身于地老天荒的历史时空里，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张忠泰看了看最后算账的结果，不等我问他，他兀自先脸红起来。

他说：你要不算这个账我还糊涂着呢，一年亏空 5000 元，大致也就是这个样子，去年孩子上学的时候，父亲拿出他平日积攒的钱把孩子的学费全部交上，到头来我还倒欠别人 2000 元的外债。

李姓老者在一旁听着，对这个账一脸迷茫，良久他才说：算得对，算得对，农民一年下来就是这么一笔账。农民最怕娃娃上学，不上吧，孩子没出息，上吧又上不起。这还是张忠泰，放在一般农民名下那可了不得，三个娃娃上学，三座大山呢。

说起孩子上学，就又说到那一对苦命的张姓兄弟，李姓老者感叹说：要不人人想当官呢，当了官就有办法，公家人总比土农民要强。

随即，一个年轻小后生说了一句民谚，说的时候他感到很新鲜很好玩似的。是升官的三条路径，也可说是一贴升官符咒：

腰里要有铜，
朝里要有人，
老婆要袭人。

前两句好理解，无非手中有钱可壮胆，朝中有人可撑腰，花钱买官，上头跑官，本也是现下官场一般套路。第三句其实也好理解，袭人是《红楼梦》里的人物，竟也是极其俚俗的名字，方言里现在还用，是美丽漂亮的意思。而第三句所指，则有些暧昧了。但是，可以肯定，这名谚既不是那些脸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民想出来的，也绝不是那个信用社的年轻小后生所能理解的。我开玩笑问玉成：是你们编出来的吧。

玉成说：是文人们编出来的。

我说：文人们编不了这么漂亮。

仍旧回到张忠泰的账单上，从树儿梁到乡政府，从张义成到张兴田再到张忠泰，两个人虽然在树儿梁算是“拔尖”的农民或者准农民，但是也反映出一般的情况。

农民最怕什么？

玉成说：一是怕“学校要钱”。学校一要钱，家长毫无办

法。没有化肥钱可以贷款，还可缓一缓，而学校的钱是断断不能缓的，上初中好一些，一上高中就开始犯愁，而要培养一个大学生中专生，简直是活剥一层皮。

二是怕天旱。天一早，投入全部扔掉，家里没有存粮，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

这两怕，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两把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照直劈下来。

农民其实不怕病，年轻人得了病还会千方百计看一看的，上了年纪的农民，小病往过扛，大病往过拖，实在拖不过就是个死。

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我在乡下碰到的一个老农民，话说到酣处，我竟开玩笑说：大爷，你怕死吗？

怕？我昨天死了都觉得迟呢！

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无奈之后的乐观。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了信用社主任说的那个张师傅。饭做得粗疏，人也生得粗笨，坐在一旁，感叹命运。他说，三个孩子还在家里，由老父亲给他带着，老父亲在家里给孩子们做饭。

吃过午饭，给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上来接一下我和玉成，因为假期将满，还得回去安顿家小，再趋车到千里之外的他乡上班。但是，车子迟迟不上来，我们俩只好宿在信用社主任的宿舍里睡个午觉。

时近中午，忽然天风大作。这是春天沙尘暴的余绪，从库布其沙漠吹过来的细微沙尘，敲击着窗户玻璃，整个天空顿时昏暗起来。睡在坑上，我思谋着该做一个什么梦。

我想梦见屋外绿云浮天，流水潺潺，百鸟飞鸣，庄禾茁壮，农人喜悦。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突然之间，大风好像有一个强悍的将领引领着，猛地掉转风头，正对着门灌过来，门咣地一下子打开了，干燥的空气里搅和着的沙土贯得人喘不过气来，沙尘在狂风的气流之中搅动、升腾，然后，呼啸而去。风吹着，耳鼓里传来一阵沉闷的巨响，我不知道这响声的源头。忽然，想起李锐先生的一部小说集，名字叫做《行走的群山》，开始，我还不大能同意这个意象，但是此刻，我仿佛真切地看见眼前群山在行走，它行走的步伐，它行走的姿式，和它行走时疲惫不堪的身影。

它就这样走过了几千年，该停下来，歇歇脚啦！

附记：此文刊发时，已是 2001 年的初秋。而当我离开树儿梁之后，连续 120 多天滴雨未降，农民们在“五一”节前后精心耕耘过的土地根本无法下种。新世纪用百年不遇的大旱迎接了这块地老天荒的黄土地。树儿梁全村三分之二的人都外出打工，重走“西口路”。全村近三分之二的大牲畜因无水无草而贱价出卖。树儿梁周边 19 万亩土地赤地千里无法下种，6 月，蝗虫又铺天盖地地向这里袭来。遍地蝗虫，黑压压地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吃的，于是愤然折翅，屈死荒野。

8 月下旬，一场大雨降在颗粒无收的树儿梁，持续 11 个小时，降水量达 88 毫米。“苦命人”张胞云的小儿子在大坝

前玩耍时，被滚滚而来的洪水席卷而走。随后，悲痛已极的张胞云不知所终。而不死心的农民趁着这场怅然而来的秋雨抢种下去的糜谷，刚长出一寸多就开始抽穗，看着这些争气的庄稼，大家都哭笑不得。

而张义成的儿子终于如愿以偿，金秋 9 月，怀揣着大连理工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地老天荒的树儿梁，到那个海风吹拂下的绿色城市去了。